

##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Temporal and Spatial Bias in News Dissemination

Jiang Bo

**Abstract:** Since December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common infectious diseases in China.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incides with the 2020 Spring Festival. With all the panic aroused by the rapid spread of the epidemic, all kinds of news coverage are coming. However, information is not fully equal to communication. The unique bia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akes it not completely establish a communication bridge with the audience. In this paper,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formation before February 12, 2020 is used as a research model. The time sequence of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epidemic has been combed. With the Edymon Carpenter's and Harold Innis's theory concept of "Media Bias", the time bias and spatial bia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this epidemic situation are deeply analyze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on the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of the news media to the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of the major epidemic has also become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 Propagation bias; Media bias;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

## 传播的倚重：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信息流动的时空偏向

姜 博

**摘 要：**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我国陆续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感染引起

---

作者简介：姜博（1993-），男，汉族，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博士研究生，台湾世新大学交换生，研究方向：新媒体与数字内容产业。

文章引用：姜博. 传播的倚重：新冠肺炎疫情初期信息流动的时空偏向[J]. 中国新闻评论, 2021, 2(4): 33-46.

<https://doi.org/10.35534/cnr.0204004>

的以肺部病变为主的新型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暴发恰逢2020年春节之际，伴随其迅速蔓延开来所引发的民众恐慌情绪，各类新闻报道铺天盖地而来。然而信息并不全权等同于传播，信息流动中特有的传播偏向性使其并没有完整的建立起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桥梁。本文以疫情暴发之初（截至2020年3前）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信息流动作为研究范本，梳理了疫情发展初期中相关信息内容发布的时间节点，借助埃德雷蒙·卡彭特的“媒介偏重”学说与哈罗德·伊尼斯所提出的“媒介偏向”概念，深度剖析此次疫情中信息传递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同时，对于我国新闻媒体对于重大疫情的舆情治理的反思与应对研究亦成为本研究所关注的题中所应有之义。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传播偏向；媒介偏重；舆情治理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一、疫情发现之初：偏向问题的提出

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出现两例不同寻常的发热病患。其临床症状虽然类似于流感，但CT诊断结果却显示二人肺部具有毛玻璃结节。经历过2003年非典疫情防治工作的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对此不明病毒的传染性保持高度警惕，随即12月27日将此情况上报于江汉区疾控中心。其率先对病毒保持警觉，为疫情防控工作拉响警报，成为此次疫情上报的“第一人”。<sup>①</sup>然而民间渠道所流传的疫情信息，则源于12月30日的一段微信聊天截图。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爆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具体病毒还在分型”的信息，其随后被武汉市公安局传唤训诫<sup>②</sup>。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医生感染病毒牺牲在抗疫前线，武汉市政府及湖北省卫健委对此表示深切哀悼。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追

<sup>①</sup> 李文亮医生在微信群同学群中曝出的聊天截图信息共包含一份病例检测结果与一段时长11秒的影像学结果，其中报告显示：检出“高置信度”阳性指标SARS冠状病毒、铜绿假单胞菌、46中口腔/呼吸道定植菌。随后李文亮在群里发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信息，虽然他强调“此次病毒是冠状病毒，具体还在分型”，可未曾想信息在被人截图后不胫而走，借助互联网平台广泛传播。

<sup>②</sup> <http://news.163.com/20/0131/10/F47BVJEJ00018990.html>.

授李文亮医生“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埃德蒙德·卡彭特在《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中提出，所有的语言都是大众传媒，每一种语言对现实的阐述都不尽相同，其都隐藏着独特抽象的文字。文字作为信息传递中的抽象符号，蕴含着某种意识的偏重。其作为思想传输的基础承载媒介，对于同一客观现实的描述可能略有区别，但其隐喻着的核心概念是先验的<sup>①</sup>。张继先与李文亮两位医务人员在疫情暴发之初已发现武汉所爆发的“不明原因”肺炎具有较强的传染性。正如张继先医生的后续采访所言，“通常情况，一家三口不会同时得同一种的病，除非是传染病”。而李文亮医生将病毒抽象的描述为“SARS 冠状病毒”，虽用词有误，但就其病毒的现象而言同样与张继先医生的定义相同，即具有较强“传染性”的风险。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其首次病毒的定义为“不明原因肺炎”，且“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在随后的一天的通报中，武汉市卫健委则称该病毒“可防可控”，给出“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地方”等建议。此外，直至2020年1月15日前多达十一期的疫情通报中，武汉卫健委多次声明病毒“不存在人传人”的现象。官方媒体的信息通告消解了民众对于疫情的认知与警惕，助长了社会中盲目乐观的情绪。

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哈罗德·伊尼斯将媒介分为两大类，即有利于时间上的延续以及空间上的延伸两大类。然而媒介所承载的传播信息往往局限于当下，其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当一种媒介与另一种遭遇时，对于“时空”的不同表征会释放出改变其他信息的接受者认知态度的力量。疫情初期的指数级信息爆发，恰恰是信息时空偏向出现规律化的可见时期。德雷蒙·卡彭特在《新语言》一文中指出，“如果使用足够多的词语和形象，我们可以用任何语言描绘任何事情；对于某一文化而言，很自然的做法是去充分利用其媒介偏重。其给定信息和见解是属于某种媒体的，但这种独特的归属感并不具有排他性。但只有通过某种媒体，我们才能以最佳的方式获取和交流这条信息和见解”<sup>②</sup>。受众能否及时获得有效信息以及对于所获信息内容的认知与定义，受限于客观事件发生初期信息流动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在此次疫情初期的信息传递中，信息发布渠道偏重于武汉市官方媒体，其消息来源因为有政府机构背书，本因具有较大的社会公信力。然而官方媒体在疫情信息通报中存在的时间滞后偏向，非但没有起到有效预警，反而使得民众对于疫情的客观认知产生严重误判。不可置否，武汉市卫健委在疫情初期信息发布中所呈现的时空偏向，使得其本应作为信息输出的“传声筒”，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之时却成了疫情预警的“消声器”。

① 克劳利. 传播的历史：技术文化和社会 [M]. 董璐，何道宽，王树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31.

② 曹忠. 埃德雷蒙·卡彭特媒介偏重概念研究——兼论文字与图像的媒介偏重 [J]. 新闻界，2019（12）：13.

## 二、疫情扩散之中：官媒报道的时间偏向

在传受双方均可作为信息“发声器”的今日，“时间”不仅为建立有效信源的传递提供对等关系，亦是一种考虑结构成分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权力形态和程序。数字时代的信息交互不再依赖于谁掌握了信息传播平台媒介，而在于谁把控着信源接收与发递的时间。然而官方媒体对于病毒爆发、蔓延、扩散具体时间的不同定义，使得受众对于疫情接收的确信程度产生极大的质疑。其集中体现在官方对于通报信息中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首例患者的发现时间的滞后偏向及模糊表述。

回顾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29日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布的信息内容及时间节点，可得出截至2020年1月9日，普通民众甚至尚不清楚如何运用准确的名称来定义这场席卷全国的病毒。据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0的第一封通报而言，仅将病毒定义为“不明原因肺炎”，并未就病毒的表征做过多的阐述；2020年1月5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从武汉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中检测出类SARS冠状病毒，同日武汉市卫健委将“不明原因肺炎”定义为“病毒性肺炎”；1月9日武汉病毒性肺炎病原检测结果初步评估专家组确定，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称呼终于开始进入民众的视野。在病毒被具体命名的同时，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根据测序数据绘制的进化树证实，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同于禽流感、非典型肺炎（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对于病毒有了初步认知的民众迫切得到相关疫情确切实际的报道，其对于病毒的恐慌情绪中不可或缺的夹带着对于官方媒体信息的质疑情绪。然而，造成恐慌与质疑的并不是真相，而是真相的缺席<sup>①</sup>。对此，本文依据官方媒体、科研机构、科研人员自疫情扩散期间（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29日）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布的信息内容及时间节点做出爬梳。见表1：《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爆发伊始的信息发布表》。

表1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爆发伊始的信息发布表

Table 1 COVID-19 initial information release form

序号	发布日期	官方媒体权威科研机构（人员）	信息内容
1	2019/12/31	武汉市卫健委	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2	2020/1/5	武汉市卫健委	武汉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最早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① 孙旭培，王勇．不同理念导致不同实践——“非典”报道与禽流感报道的比较研究[J]．当代传播，2004（3）：76．

续表

序号	发布日期	官方媒体权威科研机构(人员)	信息内容
3	2020/1/5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武汉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中检测出类 SARS 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4	2020/1/6	《长江日报》	武汉召开地方两会,截至 11 日闭幕。两会期间,武汉市卫健委未发布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报。
5	2020/1/10	国家医疗专家组专家王广发	目前整体疫情处于可控状态,没有出现参与救治的医护人员感染情况。
6	2020/1/11	武汉市卫健委	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肺炎病例 41 例,发病时间全部在 2019 年 12 月 8 日到 2020 年 1 月 2 日之间。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自 2020 年 1 月 3 日以后,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没有发现新感染发病的病人。
7	2020/1/11- 2020/1/17	武汉市卫健委	本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肺炎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报告。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8	2020/1/20	武汉市卫健委	武汉卫健委方面一次性更新了两天的新增病例数据。其中显示,1 月 18 日和 19 日两日共新增 136 名确诊患者。此次通报中,首次未提及“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的判断。
9	2020/1/20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	目前已经证实了有人传染,有医务人员被感染。
10	2020/1/23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自 2020 年 1 月 23 日 10 时起,武汉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
11	2020/1/24	国际权威学术期刊《柳叶刀》杂志;武汉金银潭医院黄朝林等 29 位医务人员	截至 2020 年 1 月 2 日,41 名患者确诊感染。最早发病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 日。
12	2020/1/27	《科学》杂志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源地可能并非华南海鲜市场。
13	2020/1/28	武汉市卫健委	1 月 27 日 0 时-24 时,武汉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肺炎病例 892 例,单日新增病例出现 10 倍增长。
14	2020/1/29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自 2019 年 12 月中旬开始,已经有证据证明病毒可以发生“人传人”的传播。2020 年 1 月 3 日,中国 CDC 已启动紧急检测和病例调查,在 1 月 6 日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1 月 11 日之前已有 7 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11 日期间,已有 248 人感染新冠肺炎。

武汉市卫健委作为疫情通报的官方媒体,在信源的整合与输出中却具有一种“时间的偏向”。其对于首发病例报道时间的前后更改,混淆不清,使得“时间”在信息的传递中的滞后模糊偏向初露头角。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近两个月后,民众对于首例病患确诊的具体时间仍旧疑惑不断。依照武汉市卫健委 2020 年 1 月 5 日发布的通报显示,最早病例的发病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2 日。然而这个结论很快在随后在其 1 月 11 日发布通报中被推翻。在武汉市卫健委《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中显示,“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发病全部在 2019 年 12 月 8 日到 2020 年 1 月 2 日之间”。首发病例为何由此前的 2019 年 12 月 12 日提前到 2019 年 12 月 8 日,武汉市卫健委并未作出合理的解释。直到 2020 年 1 月 24 日,由武汉



市金银潭医院黄朝林等 29 位作者联合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名为《2019 年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者临床特征》的论文进入公众的视野，文中把发现首例发病患者的时间再次提前到 12 月 1 日。据悉三组数据的分析样本均为 2020 年 1 月 3 日前的所有病患，然而官方的疫情通告却得出了不同的时间定义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疫情的扩散与信息的传播中滞后与模糊的时间偏向呢？

哈罗德·伊尼斯在关于“时间诉求”（A Plea for Time）的论述中，把时间偏向作为文化和传播的研究工具来使用，他把注意力指向信息传递中的时间节点，借以来分析信息主导形象及社会文化的扭曲力。有传播即需媒介，他相信媒介之于公共舆论的影响并非“风马牛不相及”，时间的偏向性作为审视“文明的局限性”工具是有效的。<sup>①</sup>截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武汉市卫健委的自疫情暴发后共发布了 20 条信息通报，尤其是在 2020 年 1 月 1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5 日期间达到了每日一通报的频率。然而，官方媒体“日更”的频率却不能满足受众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有效信息的“时间”的偏向并不在于频率，而在于信息通报中关键时间节点的及时与透明。在当今信息内容传播迅猛的时代，受众甚至有一种幻觉或是错觉，信息量越多频率越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就越容易，与世界的沟通就越发达；信息技术的增多自然保证了传播活动的广泛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暴风骤雨般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成功对话，成功分享之间并无天然联系。<sup>②</sup>哈罗德·伊尼斯曾在《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与温德汉姆·刘易斯争辩称“时髦的脑子是拒绝时间束缚的脑子”，他指出刘易斯的《时间和西方人》中所批判柏格森、亚历山大和怀特海对时间的那种宗教神秘主义般的执着并缺乏现实时间的延续性，时间点的定义并不应该具备任何形式的垄断。如果把社会中信息交往环境当作一个拟态试验场去检验，“时间”对于信息交互中所起到关键作用的重要一环。信息中的时间是简单的，因为只涉及信息本身；而传播中的时间是复杂的，因为关联到组织传播的反馈衔接。疫情之下，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内紧外松”的传统管理方式使得武汉官方媒体的消息纰漏大多以“稳定大局”为主，信息中的时间滞后偏向反而导致舆论场的割裂。若其信源因缺乏时效性而不能为事实庇护，信息传递中“时间的偏向”反倒会影响到传播者自身的可信度，成为传播渠道中的“巴比塔”<sup>③</sup>。

① [加]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 [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 100-112.

② [法] 多米尼克·吴尔敦. 信息不等于传播 [M]. 宋嘉宁,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57-60.

③ 巴比塔典出《旧约·创世记》第 11 章。传说古时候，天下人都说一种语言。诺亚方舟建好后，人们在迁徙时，来到一个叫示拿（Shinar）的地方，计划修建一座高耸入云直达天庭的塔，用以显示人类团结的智慧和力量。事情很快惊动了天庭里的上帝。上帝担心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受到威胁，施法打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他们的情感交流出现障碍，误解，猜疑不断产生，人们因此无法继续合作，建造通天塔的工程也就此荒废。“巴比”在希伯来语中意为混乱，后人把这个故事中的塔称为“巴比塔”。

### 三、疫情暴发之下：信息流动的空间偏向

1949年，西方媒介环境学派核心人物哈罗德·伊尼斯在密执安大学宣读了自己的一篇论文《传播的偏向》，文章中提出的“传播偏向论”成为他传播思想中最著名的一部分。时间和空间，以及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作为我们体制的思想框架各就其位。空间在头脑之外有一个外在的现实，而思想的规律是不能先验地加以描绘的。在思想的历史上，空间观念较为领先于时间。<sup>①</sup>书中伊尼斯进一步指出，传播的偏向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偏向于空间的媒介往往具有以“距离”为单位基准的横向平行移动的能力。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暴发之下的病毒传播的人际空间偏向、谣言传播的情感空间偏向、信息发布的智能空间偏向，其作为伊尼斯早期所提“空间偏向”的下位概念，在信息场域中往往伴随着复合化流动空间呈现。

#### （一）病毒传播的人际空间偏向

在传染病学领域，建模评估和预测病毒的传播路径、速率等对于疫情的控制非常重要。在经典的传染病学模型中， $R_0$ 值常被用来描述疫情的传染速率，可以反映传染病暴发的潜力和严重程度。若 $R_0$ 值大于1，则意味着人传人的风险增大；若 $R_0$ 值小于1，则意味着病毒的传染力趋于消失。2020年的1月24日，香港大学Kwok-Yung Yuen团队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柳叶刀》杂志发文，给出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速率、峰值等评估结果，其新冠病毒 $R_0$ 值为2.68。作为参考，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最初 $R_0$ 值为2.9（不包括超级传播者），随着疫情暴发期升至2.0-3.5。可见此次新冠病毒具有较强的传染能力，其纵向空间传染力几乎与非典型肺炎相当，其传播的空间更具有流动的倚重，偏向于熟人空间产生的互动，即“人传人”。

依据官方通报而言，武汉市卫健委从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11日期间均明确表明“没有发现病毒明确的人传人证据”，而在1月15日至1月19日连续五天的通报中，则均未对医务工作者能否有感染作出说明。而在随后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则明确说明病毒已发生人传人的迹象，已经出现有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播数值，“人传人”无疑是最明显的传播迹象。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的初始病例来看，2019年末入住武汉部分医疗机构的首批7名“不明肺炎”病例均来自华南海鲜市场，随后转入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多位病患均有过华南海鲜市场的接触史，首批病患中九成均为华南海鲜市场的商贩及老顾主。与此同时，“人传人”所衍生的<sup>②</sup>“超级传播者”与医务人员间所产生的互动也逐渐被揭露。而在此次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一位脑神经外科的病患于武汉协和医

① [加]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 [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 28-29.

② “超级传播者”的概念源于17年前的“非典时期”，原卫生部疾病控制专家提出，若1人携带病毒传播了10人以上，而且被传染的人都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那么这个传播者就可称为“超级传播者”。这一判定标准随后也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

院做手术时，携带了新型冠状病毒并传染给4位医务人员及10名神经外科护士，病毒与医疗空间的互动逐渐引起国家卫健委的重视。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现象，疫情存在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最终得到专家的认定。

然而，病毒传播的速度远比人们预想的要快。据我国卫生防疫专家强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的肺炎传播途径主要为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而人作为空间移动的个体，是病毒携带扩散的主要载体。作为疫情暴发地的武汉九省通衢，每年春运期间约承载三千万人。就铁路枢纽而言，其铁路网络贯穿全国的东西南北；即便选择公路出行，武汉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交通要塞。地域空间的互动扩散使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进一步蔓延到全国各地，同时也使得湖北省内以武汉市为中心的临近卫星城市成为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即便截至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于1月23日下发“封城”通知，即“武汉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已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剩余900万人留在城内。

表2 2020年1月23日武汉居民省内迁出目的地 Top10

Table 2 Wuhan residents moved out of the Top10 destinations in Hubei province (2020-01-23)

迁出目的地	孝感	黄冈	荆州	咸宁	襄阳	随州	荆门	黄石	鄂州	仙桃
所占百分比	19.91%	14.12%	7.31%	4.90%	4.24%	4.15%	4.07%	3.76%	3.59%	3.34%

数据来源：百度地图智慧眼 百度迁徙。

表3 截至2020年2月12日武汉居民省内迁出目的地疫情人数统计表

Table 3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confirmed epidemic cases in Wuhan residents' relocation areas  
Top10 as of 2020-02-12

迁出目的地	孝感	黄冈	随州	荆州	襄阳	黄石	鄂州	宜昌	荆门	十堰
感染人数	2751	2398	1129	1110	1088	874	861	784	696	536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 阿里健康。

伴随“武汉城市圈”的建设，武汉和孝感、黄冈、咸宁、黄石、仙桃5个城市之间构建了“60分钟”直达的城际交通，通行时间全都在一小时以内。据百度迁徙数据的统计，封城当日武汉居民的迁徙出目的地中湖北省占比72.46%，其选择迁出的10个省内城市所占比重可见表2：《2020年1月23日武汉居民省内迁出目的地 Top10》。孝感、黄冈等地成为“封城”前夜武汉居民所迁出的首先目的地。同时，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4日11点30分，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人数达到500以上的城市除武汉外共有6座，



其均位于湖北省内，分别为孝感、黄冈、襄阳、荆州、黄石。依据下图“城市接受武汉流出人口数量和该市新冠肺炎病例数关系的相关系数随时间变化曲线”可得出，病毒的人际传播数量分别与居民迁出目的地的比例呈正相关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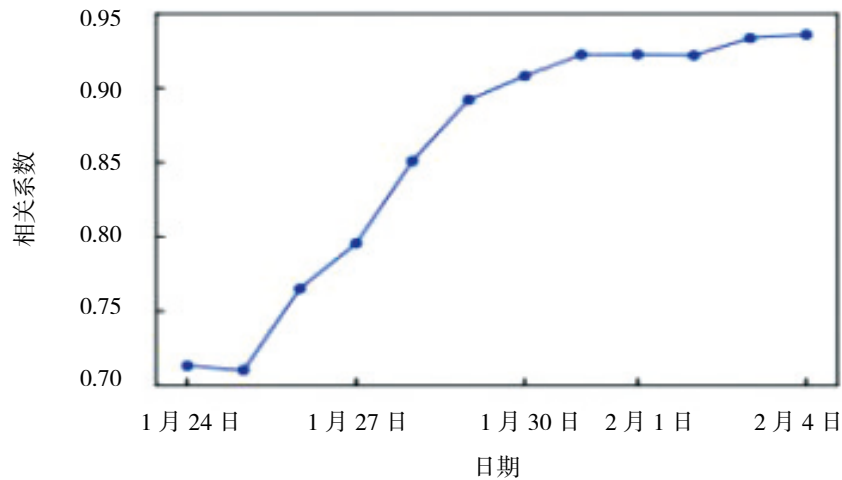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接受武汉流出人口数量和该市新冠肺炎病例数关系的相关系数随时间变化曲线图

Figure 1 Curv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umber of outflow population and the number of cases in Wuhan over time

此外，随着时间的增长，城市接收的武汉迁出人口数和该城的病例数相关性逐渐增加。依据表3：《截至2020年2月12日武汉居民省内迁出目的地疫情人数统计表》，作为武汉居民迁出目的地的前10所城市中除去宜昌市与十堰市的其他8所城市均是湖北省除武汉外的疫情重灾区，其中孝感市感染人数为2751人，占比湖北省感染总人数的8.24%；黄冈市感染人数为2398人，占比湖北省感染总人数的7.18%。自1月23日武汉市封城之后，其居民省内迁入目的地的城市间的占比与迁入城市疫情人数在湖北省的占比极为接近。由此可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人际空间传播的偏向性。

## （二）谣言传播的情感空间偏向

谣言即指社会大众中相互传播的无根据、不确切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传播时未获官方渠道证实，这种传播行为本身则带有集群性。谣言往往起于私人和社会，因迎合了社会某种普遍的不满或恐慌情绪而被生产、加工和再造，并以几何级数的方式使这种不满或恐慌情绪得到繁殖和扩散，最后达到社会共振的效果。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卡普费雷提出类

似的公式，即：谣言 = （事件的）重要性 × （事件的）模糊性。<sup>①</sup> 基于上述论述，可以明白为何谣言一般发生在“重要事件”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信息真空期”。而基于当前谣言数量及传播速度而言，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期的谣言均远超前非典时期。如今已步入数字化时代的民众相比非典时代刚接触互联网的受众而言，拥有着更便捷更快速接触信源的传播渠道。新媒体社交软件搭配各类新闻客户端及自媒体平台使得消息的传递较以往更加迅猛。信息的快速传递、交互本为了打破谣言公式中的“重要事件的信息真空期”，然而事实却事与愿违。

在武汉封城的三天后，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恐慌和疫情会造成同样的损害”。在有疫情的情况下，公众出现慌张情绪并相信谣言，由此引起的后果，不比疫情本身造成的后果差。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病毒攻其身体，谣言攻其心灵。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哈罗德·伊尼斯所提出，我们需要开发或是完善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的意义。在其看来，每一种文明的传播都有局限性，而传播的空间偏向使得文明的局限性更加彰显。<sup>②</sup> 伴随2016年“后真相”一词被纳入《牛津大辞典》，麦克唐纳指出伴随真相与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不断忽视误解，情感偏向日益成为引导舆论的主导因素。相对于事实本身，公众更愿意接受迎合自己情感诉求的信息。伊尼斯的“空间偏向”论述在后真相时代下，无论媒介组织抑或是受传者，均逐渐呈现出“以情感驱动信息传递”的偏向性。自2019年末疫情暴发已有近三个月时间，在“人传人”主导下的病毒传播空间中往往伴随着以情感空间为偏向的谣言传播，疫情的复杂程度使得我国的卫生防控体系与舆情引导机制同样面临着一场大考。

据以往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只有被社会所公认的“权威”才可能有能力通过确切且充分的信息“与谣言进行斗争”。其公信力让大众相信权威话语等同于揭示真相，将大众的行为拉回到惯常的轨道上。然而在此次疫情暴发初始，武汉市政府对于疫情的公开渠道单一，公开内容有限。不可置否，以武汉市卫健委为首的武汉官方信息通报错过了扛起权威话语的最佳时期，其提供信源的模糊与不确切反倒使得公众对于此后的官方信息抱有存疑抵触情绪。权威媒体的信源不准确或是通报不及时，使得民众面对重大疫情却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确切的信息，一时间不由得对于武汉市卫健委的疫情通报充满质疑。而介对于此时，新媒体平台及个人所散布出的谣言恰好迎合了民众对于信息的接受与扩散所呈现出的情感空间偏向，以承接民众对于权威信息的抵触情绪、对于病毒防疫的恐慌情绪、对于疫情控制的误读情绪。基于此，笔者收集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进入民众视野后的20条流传较广的谣言作为分析样本，见表4：《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谣言信息表》。

① 陈国战.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网络谣言[J]. 探索与争鸣, 2014(6): 88.

② 陈金锋. 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时空—文明研究[J]. 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1): 108.

表4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肺炎（COVID-19）的谣言信息表

Table 4 Rumor information about COVID-19

序号	发布日期	信息内容
1	2020/1/1	武汉暴发的不明原因肺炎已被证实为“新型 SARS”病毒
2	2020/1/2	武汉出港航班发现疑似传染病人
3	2020/1/5	“非典”再次来袭武汉，已暴发 3000 余病例
4	2020/1/18	武汉医护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多名医生牺牲
5	2020/1/22	武汉卫健委领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逃往上海
6	2020/1/23	武汉三口之家迪士尼游玩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7	2020/1/24	湖北经视主持人记者戴口罩播报新闻
8	2020/1/25	四川高速封路
9	2020/1/26	明天早上四点杭州飞机洒消毒药水，大家不要出门
10	2020/1/28	海鲜会传染新型冠状病毒
11	2020/1/28	多洗热水澡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12	2020/1/28	病毒喜欢 0 度湿冷环境，空调开到 20 度就死亡
13	2020/1/29	武大人民医院医生提醒：29、30 号两天是暴发期
14	2020/1/30	武汉红十字会售光山东寿光捐赠的蔬菜
15	2020/1/30	万金油可以预防病毒
16	2020/1/30	亚洲人更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17	2020/1/31	用过的口罩放到消毒柜里消毒可继续防护新型肺炎
18	2020/1/31	吃阿奇霉素片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19	2020/2/3	新型冠状病毒插入的基因片段经过精心选择，是人工病毒
20	2020/2/5	新风系统会传播病毒，导致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数据来源：腾讯较真辟谣平台。

生活在万物互联的开放信息中的大众，往往会对突然而至的原子化生活措手不及，进而产生恐惧与不安的情绪。当疫情暴发的第一时间，民众从以武汉卫健委为首的权威媒体得到信息却无法填充自己的情感空间，一时间谣言接踵而至。环顾疫情之初所散发的谣言，大多围绕着“武汉不明肺炎”的病毒类型界定、病毒是否具备“人传人”的扩散趋势、所感染新冠肺炎的具体病例究竟有多少等。例如 2020 年 1 月 1 日所流传的谣言“武汉暴发的不明原因肺炎已被证实为新型 SARS 病毒”、2020 年 1 月 2 日所流传的谣言“武汉出港航班发现疑似传染病人”、2020 年 1 月 5 日所流传的谣言“非典再次来袭武汉，已暴发 3000 余病例”等，其均是在民众心中对于疫情没有完全认知的情况下，利用人们对于官方媒体、权威信息的质疑与抵触情感偏向进行大肆传播。费尔迪南·索绪尔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和语言是一体的存在。<sup>①</sup>文字的重要作用就是建构思想，而思想的结果往往是认知和概念的产生。绝大多数经历过 2003 年非典时期的民众对当年席卷中华大地的“SARS 病毒”抱有恐慌，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谣言借助“SARS 病毒”的概念，再次建构起民众对于病毒的恐慌情绪，达到进一步的情感偏向渲染。

① [瑞]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高名凯,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具有“人传人”的倾向，谣言流通也同样具备“人传人”的偏向。在公众重拾对于权威信息的信任度之后，其后的谣言更具有渲染病毒防疫的恐慌情绪的偏向以及疫情控制的误读情绪的偏向。例如在2020年1月18日所流传的不实信息“武汉医护人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多名医生牺牲”；2020年1月22日所扩散的谣言“武汉卫健委领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逃往上海”；以及2020年1月23日的散布虚假信息“武汉三口之家迪士尼游玩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此类型谣言流传的背后都折射着疫情下每个人对自身处境的恐慌以及随时有可能陷入危机的担忧。此外，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之后，复刻“封城”通告的不同城市版本信息随之袭来。先是1月25日便传来“四川高速封路”的不实消息；随之在1月26日甘肃传来将利用飞机空中泼洒消毒液的不实信息后，杭州也出了同版谣言，即“明天早上四点杭州飞机洒消毒药水，大家不要出门”；其后是1月30日的假消息“万金油可以预防病毒”以及1月31日的谣言“吃阿奇霉素片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其均透露着民众对于疫情不论是政策防控抑或是药物防控的误读情绪偏向。梳理此次疫情中所散布的谣言可看出，谣言信息的传递同样具备一种偏向。偏向于针对病毒防疫的恐慌情绪及疫情控制的误读情绪。此类谣言虽然无法在物理上帮助谣言的受者解决实际问题，但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安定和抚慰民众焦虑和恐慌的心情，让民众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一些掌控感。同时，当一些谣言使人心态失衡甚至趋于崩溃时，如果没有权威知识的介入和引导，人们就会倾向于寻求另一些谣言，以纠正自己内心的情感空间偏向，使心态重新归位达致平衡。

针对于此，2020年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Ⅱ级应急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全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由省卫生健康部门发布，武汉市卫健委不再发布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情况。两天后的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做出重大举措，公开向社会征集线索，任何瞒报和漏报肺炎疫情的情况一经发现将被严肃处理。随后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携手微信新增疫情上报系统。民众可直接通过微信小程序将有关地方及部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等问题线索，以及改进和加强防控工作的意见建议上报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坚决保障疫情防控公开透明；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携手支付宝打造“抗击肺炎专题”，将全国疫情数据全天实时公开，此举无疑增强了民众对官方公布数字真实性的信心。同时国家大力支持丁香园、腾讯较真辟谣平台、八点健闻等自媒体平台进行线上辟谣，切实利用新媒体的传播力量粉碎网络中流传的谣言。伴随着国家将疫情日报、数字时报的决心，谣言数量日益减少，民众对于官方媒体的信源播报重拾信心。同时反映出相隔17年后我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相较于非典时期的进步之处。

### （三）信息发布的智能空间偏向

受时代所限，哈罗德·伊尼斯曾把广播和电力技术误认为是机械技术模式的进一步延伸，



广播传播万里，覆盖广大地区，由于不受文化程度的拘束而打破了阶级界限，有利于信息的集中化发布。然而广播作为新媒介，是不同于以往的挑战。它诉诸人的耳朵，而不是人的研究，因此它强调的是集中化，以力求说明眼睛的空间约束力和耳朵的时间约束力，进而解放流动空间中的情感偏向。新传播媒介的后果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中，并且随着战争的进程而加剧。军队将其广泛用于作战和宣传，既用于国内宣传，也用于对敌宣传。<sup>①</sup> 数位时代下，获取信息的“某种媒体”不再仅仅是广播与电视，正渐渐转换为人工智能技术所引领的“智慧媒体”，其表现在信息的发布愈来愈具有智能空间偏向。

然而算法介入信息发布的智能空间偏向一直伴随着“善”与“恶”的讨论。人工智能渗入信息内容生产所带来极大变革的同时，也面临着伦理拷问。媒体技术虽然重构着新闻生产的环节，但其发展并不是中性的，且带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属性。设计、接收和维持技术的建构者，其价值观与世界观必将体现于技术本身。<sup>②</sup> 算法的运行过程是获取数据，筛选数据，分析数据，阐释数据的过程，其不同于人类决策，均是形式化的，嵌入算法中的计算理论并非“神不可宣”，从理论而言，它们是可以被充分描述和重复验证。<sup>③</sup>

疫情当下，业界相关新闻播报开始尝试“人工智能+疫情通报”的组合防控模式，借助云超算能力及运算集群支持实时收录并更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与疑似病例，通过大数据信息整合后将疫情信源反馈于新闻制作中心。2月8日，山西省重点新闻网站黄河新闻网首次接入相芯科技AI虚拟主播，为全省市民快速播报最新疫情。其只需要连接大数据端口取得疫情信息，输入相关文字的疫情简讯，便可迅速生成播报视频进行疫情通报。视频化的新闻内容虽然保障了不具备通过传统搜索引擎获取资讯的受众，例如老人儿童、文字阅读障碍者等第一时间获悉疫情近况，但也使得信源的客观公正的风险在智能空间中无形加剧。

曼纽尔·卡斯泰尔认为，伴随信息经济的异军突起，空间并不是某一个地域，而是对同时性和选定时间的物质支持。<sup>④</sup> 智能空间下的信息发布过度依赖于算法及大数据的提供，反而容易忽视智能算法本身的偏向性。如果输入的初始数据存在误差或者存在导致偏见的可能性，那么算法最终输出的结论就有可能存在偏见。程序员在对于算法的设计之初，对于算法法则，数据选取，结果输出，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初始设定，均反映着其自身看待世界的视角和观点。设计者的刻板印象和个人偏见会影响到算法数据的客观程度。数据输入与结果输出的中间过程无法被信息接收者所了解，“算法黑箱”由此产生。<sup>⑤</sup> 不可置否，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发

① [加] 哈罗德·伊尼斯. 传播的偏向 [M]. 何道宽,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8: 118.

② John M Staudenmaier. Technology's Storytells: Reweaving the Human Fabric, Cambridge [M]. MIT Press, 1985: 165.

③ 陈昌凤, 虞鑫. 智能时代的信息价值观研究: 技术属性、媒介语境与价值范畴 [J]. 编辑之友, 2019 (6): 9.

④ [美] 曼纽尔·卡斯泰尔. 信息化城市 [M]. 崔保国等,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359-360.

⑤ 克里斯托弗·苏达克. 数据新常态 [M]. 余莉,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62.



布在收集数据、提取特征、预测决策等环节中更加需要“把关人”的角色。其概念也不同于以往传统新闻生产中的定义，仅记者或媒介组织便可担任新闻内容“监管人”的角色；智能空间下的信息“把关”环节则更应该是多领域跨学科多元协同完成的严谨过程。

## 四、结语

截至2021年10月，距离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过去一年有余。回顾与反思疫情暴发之初所传递出的信息报道，相关媒体的集体预警迟怠与消息表述的模棱两可均带有着一种传播的偏向。持有这种偏向下的权威媒体信息传播中的原生机理，一定程度加剧了病毒扩散的风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17年前的非典疫情相比，我国对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信息公开已有所进步。分析疫情之下的传播空间倚重可得出，谣言与病毒相比同样具有“人传人”的空间偏向，其不仅体现于人际或是地域的空间流传偏向，更是一种处在后真相时代下的受众情感迎合偏向。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信息的及时性与信源的准确性尤为重要。与医学科研人员识新型病毒同理，新闻工作者在对于信息的选择与把控也经历着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作为官方媒体，有义务在接收到最新信源后将信息公开及时地传递给民众，避免信息报道的偏向带来不必要的误导。本文借助埃德雷蒙·卡彭特的“媒介偏重”学说与哈罗德·伊尼斯所提出的“媒介偏向”概念，以传播媒介中的时空偏向视角认知与评价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下所发声的新闻信息，旨在为此后的重大疫情信息传递提供借鉴之思，以消除传播环节的负面偏向。当下，全球新冠疫情的阴影仍未散去，海外疫情警报拉响。然而，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及全国人民的努力，中国本土疫情防控成效斐然，经济发展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曾改变。基于此，疫情之下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痛苦未尝不会凝结成集体记忆，终将成为我国发展进步过程中的精神财富。